

中华文明的革新精神

袁行霈

编者按：“国学论坛”作为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创新工作方式、增强全国文史研究馆工作活力的文史学术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了四届。2018年11月31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五届“国学论坛”聚焦“中华文化中的革新精神”这一主题，阐释中华文化中包含的变化、创新观念，以期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改革文化和革故鼎新、推陈出新的精神，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汲取继续前进的丰厚养分和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切实贡献。

本文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在开幕式上的致辞，袁先生从先秦典籍开始，历数革新精神在中华文化中的各种体现，旁征博引、援古证今，指出中华文明中不断革新的刚性和韧性对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强调，文史馆的工作也应当与时俱进，守正出新，发挥优势，以不同于其他机构的、高水平的成果服务新时代。本刊特发此文，以飨读者。

众所周知，在世界几种主要的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而且延续至今的。这是甚么原因呢？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明具有不断革新的精神，也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刚性和韧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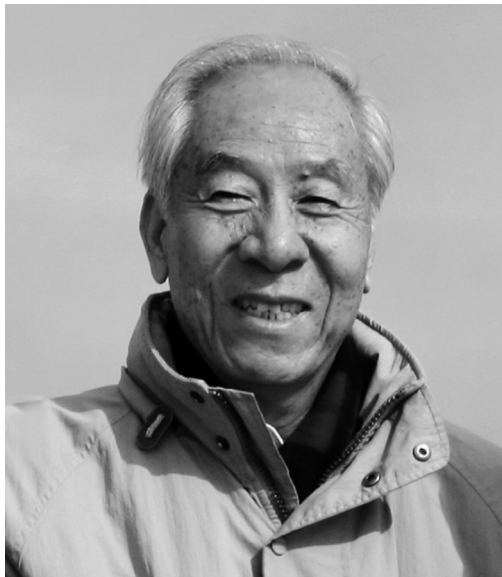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保守的，认为弘扬传统文化是保守主义，这不符合事实。

首先，从思想的层面看，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变革”的道理。《礼记·大学》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易”可释为“变易”，即顺应时势做出变革，将变革视为宇宙的普遍规律，《周易·系辞下》里有这样几句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第四十九卦《革卦》专讲变革，“革”的意思是“去故”，接下来第五十卦是“鼎卦”，“鼎”的意思是“取新”。“革故鼎新”这个成语就是由此而来的。《革卦》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思是：四时的循环与万物的消歇，是由天地的变化形

成的，商汤和周武王所发动的革命，顺乎天意和人心。这段话对变革表示了高度的肯定和赞美。

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提出了自然、仁义、兼爱、法治等新的观念，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我在这里不能全面展开论述，只举一个小例子，周礼本来重视礼的外在形式。但春秋以来，各级贵族僭越礼制，讲究奢华的祭器和乐舞，这不仅造成极大的浪费，也破坏了礼乐的核心精神，孔子一方面主张恢复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另一方面，又揭示出“礼”的核心，他说：“礼也，与其奢也，宁俭；丧也，与其易（顺乎礼的形式）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对礼所作的阐释具有革新的意味。

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逐渐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士人吸取阴阳、五行学说建立起一种新的“天人感应论”，以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后人称之为“汉代新儒学”。



袁行霁，江苏常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八、九届民盟中央副主席。主要著作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陶渊明影像—文学史与绘画史之交叉研究》《中国文学概论》《唐诗风神及其他》《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主编）《愈庐集》《学问的气象》《中华文明史》（四卷本，第一主编）等。

唐宋时期中国的士大夫融汇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思想，形成以慧能和神秀为代表的中国禅学，这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排斥外来文化。而宋明理学（或称道学）是对儒学进行“革新”的一种新的思潮，它和两汉以来的儒学相比，增强了思辨性。什么是理学？冯友兰先生说：它所阐述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什么是人，一个是怎样做人”（《中国哲学史》）。理学的代表人物如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至今还受到重视。

其次，在制度层面，也经历着不断的革新。像商鞅、王安石这样著名的改革家，他们的精神至今受到尊重。

周人所建立的分封制维系了西周二百余年的历史，但随着各地诸侯势力的扩张，中央王朝逐渐衰落，传统的分封制已经不能维持国家的稳定。秦国因商鞅的变法，增强了国力，统一了天下，并用新的郡县制取代了原来的分封制，由此推动了我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形成。

西汉初期，兴起一股反思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并寻求变革的思潮，贾谊的《过秦论》可为代表。西汉兴起的“革新”思潮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如以察举制代替贵族世袭制，察举制是经过推荐、考核来任用官吏，考核的标准着重于孝廉、茂才、直言、极谏。这比贵族世袭前进了一大步。察举制到后来出现许多弊端，隋唐以后，又以科举制代替察举制，科举制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再如，从唐初实行的租庸调法，到中唐的两税法，再到明朝中叶改行的一条鞭法，税制经历了多次革新。至于王安石变法已为大家熟知，在这里就不必细说了，他的某些具体措施在执行过程中有所失误，但他所秉持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革新精神是弥足珍贵的。

综上所述，革新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历史上的革新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持久，有的短暂，各有其复杂而具体的原因，例如革新的时机、用人的当否、当权者的决心、民众的拥护程度，以及是否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等等，其中有许多值得探讨的课题。

近代以来，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导致中国走向衰落的原因，主张放弃传统，全盘西化，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我们既不能无视并拒绝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也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只有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放眼世界，吸取各民族文化中优秀的成分，从实际出发，大胆革新，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我们对待传统应该采取自信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现在，西方文化已暴露出各种危机和乱象，中华文化能够提供自己独特的智慧，为人类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应具有这种文化的自信和担当。

文史馆这些年来所做的许多工作，就是为这个宏伟的目标服务的。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守正出新，注意发挥文史馆的优势，使我们的工作更具有文史馆的特点，以不同于其他机构的、高水平的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世纪》杂志顾问）

责任编辑 崖丽娟